

拍武俠片傳遞愛國精神 以中國人為傲

徐小明：國安法為港療傷固本



對於生長在英國統治、兩岸政治對立時代的香港人來說，愛國二字說來簡單，切實落到行動上談何容易。從1979年祖國內地剛剛對外開放，著名導演、歌手兼演員徐小明便帶頭前往百業待舉的內地，為當時荒蕪的影視市場效力一份。時隔41年之久，徐小明歷經了創作愛國歌曲不被看好、內地拍戲被台灣勒禁、到現今今日面對泛暴派侮辱內地同胞，企圖對愛國愛港人士圍攻滅聲的狀況，他始終只有一句話：「我很驕傲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毫不猶豫地支持國安法在香港落地。」同時，他希望政府以三個階段：止血止痛、祛瘀新生及固本培元來治好受傷患病的香港。

過去的動盪一年，徐小明無懼黑暴，大膽發聲支持香港警察，支持中央「出手」設立香港國安法，還香港安定繁榮。他說：「國安法的出爐是一個好時機去大刀闊斧地對香港各方面進行改革。」他認為可用中醫治病的手法以處理香港目前的問題，更建議香港政府要達到有效實施的目的，便要分為三步去落實。

要嚴厲執法才可止暴制亂

徐小明說：「像我們練武的時候受了傷，第一件事一定是止血止痛；第二件事則是祛瘀新生，這樣才能有新的生機生出來；第三個步驟就要固本培元。香港國安法就是止暴制亂的藥方，政府實施時就需要用嚴厲的手法執行，否則香港不能止血止痛；然後要祛瘀新生，清除政府部門、公共事業、教育法律方面的『反中禍港人士』，對冥頑不靈的群體是不需要再容忍、不能手軟了。不然的話，立法是沒有意義，只會被不法之人不斷衝擊，試探底線，改革無法見效；最後步驟就要固本培元，鞏固自身，現在香港真的需要很大力去改革，特別要從教育上去改革。從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愛國教育着手，這樣香港才有希望。」

社會上要有強大的愛國愛港力量，香港才能真正回歸祖國。現在香港一些名人、藝人，只會「暗中」愛國，不敢宣於口，而他一直能堅持做個愛國藝人，支持不同的愛國活動，他說：「我從沒有壓力，因為自己不是『忽然愛國』，愛國愛了幾十年，從沒理會別人怎樣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愛國，要看個人本身的根在哪裏，這個很重要。」徐小明說。

他認為愛國情懷應當在骨子裏，而不是貪圖面前利益，假惺惺捍衛祖國。「不少影人兩面三刀，一面北上賺人民幣，另一面不願意為祖國發聲，甚至思想激進反政府、『唱衰』內地，這讓真正愛國的人士看到也很不舒服的。」徐小明認為在大是大非之前不能模棱兩可，不管你碰見何種惡劣的環境，受到各方面的一些威脅，我們還是要保持我們的愛國精神。

粵劇世家講求「忠孝仁義」

童星出身的徐小明，自小身邊便圍繞着有頭有臉的老伯名家，「我做童星的時候，身旁的每個老大哥，如吳楚帆、張活游、張瑛等都是愛國藝人，經常談論香港淪陷、受辱後翻身等故事，自然會感受到要珍惜和平感激國家，都激發起愛國情懷，這些都是能夠產生良好效果的教育的。」他認為從小家庭教育和父母師長指導是重中之重，不能輕言忽略。自己流着炎黃子孫的血液，卻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身為知識分子還跑到國外去求外國人插手制裁，這是漢奸所為。作為父母就要指出來。他的一對子女也是在外國留學回來，他也不時將中國歷史故事講給他們聽，傳遞中華民族精神給他們。

「我是粵劇世家，粵劇故事中間最重要的是講求『忠孝仁義，善惡分明』的精神，如果我們的作品中不鼓勵愛國家、愛民族，全講娛樂、風花雪月是沒大意義，就算言情作品講愛情，也需要強調做人要有善良的價值觀，什麼是正確、錯誤，是非要分明，對社會有貢獻是很重要的。」他



■ 早年拍攝《木棉袞裳》時，導演徐小明（左）與攝影師李萬傑在精選拍攝角度。

■ 徐小明經常參與愛國愛港活動。



■ 徐小明於1979年已北上發展。

旨，想的就只有『我是個中國人』，並沒有想到唱紅歌愛國這麼廣泛的事情。」

愛國教育需生動循序漸進

早前一場對抗新冠肺炎疫情戰爭大家都十分疲憊，徐小明和羅堅就合力創作了一首為勉勵抗疫而作的新歌《祝福以後》，這首歌最近獲第11屆華語金曲獎，由羅堅作曲及編曲，徐小明作詞，徐小明和兒子徐浩崑合唱勵志歌得獎，令徐太太非常開心！全家都很正能量。

他知黑暴事件令許多家庭都出現政見不同而爭論，造成「黃藍對戰」，令家庭嚴重撕裂。

「社會出問題，青少年出問題，其實反映父母、學校教育出問題。好多家庭發生矛盾都是因為子女不聽父母講，年輕人大多數都容易情緒過激，並不只是某個家庭或者某個個人問題，基本上是教育的失陷。」他說。

徐小明又回憶自己從前讀書說一句髒話都會被老師嚴厲教育，但是現在年輕人卻毫不在意，男女在大街上也肆無忌憚講粗口，在示威場合集體講粗口，甚至在學校畢業禮都對着師長嘉賓做不禮貌行為，完全失禮、失格。

武、俠精神緊扣國家民族情懷

2014年的「佔中」事件，很多學生走上街頭做霸王，毫無理性，讓徐小明意識到教育是關鍵，很重要。「所以，我會不厭



■ 徐小明作為中國人感驕傲。



■ 徐小明和兒子徐浩崑合唱的勵志歌《祝福以後》獲第11屆華語金曲獎。



■ 徐小明（左）幾十年前已赴內地拍戲，圖為1998年他作為《中華大丈夫》導演為趙文卓講戲。

資料圖片

香港電影業每況愈下，徐小明並不認為香港電影產業「已死」，只是需要很大程度上的變通、改革。「香港電影在黃金時代創造了黃金一般的電影神話，有着不可否認的獨特文化印記，但這源於那個時代的『英雄造時勢』。當時的電影人既有中國的傳統文化做基礎，也受了很多西方電影的影響，荷里活的工業也影響了當時我們的產業節奏。」

徐小明指從前是帶着觀眾走，「戰後和平是當時很重要的戲種，是『入世』的戲。從反映當時的社會環境，直到多姿多彩的武俠電影，都充滿了創意和精神符號。現在的年輕一代會比較重視一個快消和大數據，久而久之創意會喪失掉。」目前電影的市場是本末倒置了，「電影老闆們是在追逐年輕人，迎合他們的喜好，但以前我們是走在觀眾前面的。」

香港影人應多學接地氣

徐小明認為內地的電影產業發展之快速是很讓人震撼的，「雖然不敢說去和世界級的相比，但是他們步伐跨得太大了。」他稱資源便存在於觀眾中，所以能夠產生更大效應的創意。他時常被問道在內地拍戲會否感受「不自由」，徐小明搖頭否定道：「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地方性的掣肘，但不代表這就是沒有自由，任何地方都需要協商。」他覺得香港的電影創作人不應該再去盲目追求某些題材的所謂局限，而是放開眼界去探索更好的東西，「不要忽略了『背靠祖國，香港對外』。」

「香港電影要去學習如何接地氣，因為香港影人的風格偏向於戲謔，香港的導演或者創作人員無法給內地的機構信心，敏感題材不放心畀你拍，我們應該好好去學習如何正視，然後再去協商。或者拍其他題材呀，其實很多香港導演在內地拍主旋律題材都很成功，值得借鑒。」他又批評現在電影圈過分盲目追求票房的數字，「投資者做生意無可厚非是要講盈虧，但是公益、教育題材的電影卻因此沒有人涉及了。」

電影能有教化作用

「現在大家都覺得每當內容涉及家國情懷便很老套，這樣便導致年輕人完全沒有機會去接觸這件事情了。很大一部分香港及內地青年人都不能清晰知道我們中國的過去，這十分遺憾，從來不接觸中國的文化歷史，不了解現在的中國如何從艱苦磨難中站起來，就永遠不會珍惜，不會感覺到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他補充道：「教育沒有注意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確是香港的缺陷，我不是教育家，我只是一個電影人、電視人，我拍的戲還是保持我的原則，我的作品都是帶有愛國精神、善惡分明的題材，這是我給觀眾的信號。記得有一次，一名解放軍高級軍官見到我時講，因為在年輕時看了《霍元甲》，激起其保家衛國、弘揚民族精神的情懷，所以就從軍報國了，這句話令我非常感動。今後，我會用作品中的情節和感染力，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忠義、什麼叫善惡、珍惜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這方面我應該有能力做得到，希望仍有機會讓我繼續做這個工作。」

他認為單靠私人投資教育意義正能量電影是不實際，不單止香港及內地的政府都應當去提倡或資助影人創作正能量的影視題材，政府機構、良心企業應當成立一個基金的形式，增加正能量電影的創作量，在一年當中提供若干製作經費給有人拍這類題材的人，實際上也是一種商業運作，並且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既能夠幫助機構的宣傳，也能對中國文化有貢獻。